

1993年双月刊



江西

1

文史

资料

- ☆ 周恩来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
- ☆ 蒋经国在江西纪实
- ☆ 顾祝同策划“皖南事变”内幕

江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办

改刊致读者

七届江西省政协成立伊始，本刊即以新的面貌呈现于您的面前。从1993年开始，本刊改为双月刊。改刊后，本刊继续保持原有特色，并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求得改进：

（1）“三亲”史料与非“三亲”史料并重；尤其欢迎以纪实性见长，又有较强可读性的文稿。

（2）图文并茂，更欢迎提供历史图片。

（3）栏目众多，编排新颖；本刊拟设政坛忆旧、人物春秋、怀念集、峥嵘岁月、历史大特写、军史纵横、赣籍将领、文化篇章、舞台史话、经济史苑、历史内幕、沧桑录、百年钩沉、地方风物、拾遗补阙、文史评介等数十个栏目，并随时增设新栏目。

本刊愿成为您笔耕的园地，腾飞的翅膀。

本刊愿您在轻松的阅读中获得一些历史知识，并得到有益的启示。

本刊愿成为您忠实的朋友！

要目简介

谈笑凯歌还 周恩来唯一一次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。周恩来看了一眼二楼 25 号房：“我没有住在这里。”周恩来与大家合影时说：“年青人站前排，你们是接班人嘛！”

滔滔赣江东逝水 徐君虎南京落难，蒋经国称徐君虎为“老虎”，蒋经国是留苏学生中年龄最小的，还加入了共青团，蒋经国用俄语高呼：

“打倒蒋介石！”蒋经国最讨厌阿谀逢迎的人；……

我的父亲是张天师 张天师为李烈钧主持三天四夜的寿醮，侵华日军进犯上清时，窥见一位白须老人手执金鞭立于云端；张天师教育子女：生活要靠自己；张天师的女儿嫁给了贫寒书生。

顾祝同策划“皖南事变”内幕 顾祝同只给了新四军六枝步枪，蒋介石斥责顾祝同的部队“抗战中成绩最坏、纪律最差”；顾祝同向叶挺表示：以政治人格担保新四军北移安全；蒋介石手令：活捉叶挺奖十万元，活捉项英、袁国平各奖五万元；新四军被俘的六位高级干部被囚于上饶，其中四名共产党员被害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赣东北人安贫乐道，安土重迁；赣东北人重礼好客，诚挚热情；赣东北人崇尚公益，乐善好施；赣东北人的婚嫁礼仪热闹隆重，赣东北人的生辰寿庆铺张浪费，赣东北人的丧葬礼仪迷信浓重。

江西文史 资料(双月刊) 1 1993

改刊致读者

怀 念 集	谈笑凯歌还	徐 巍
	——记周恩来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……凌家传(1)	
	电波, 永不消逝	
	——周恩来与“第二战场”的机要通讯……刘三元(7)	

历史大特写	滔滔赣江东逝水	
	——蒋经国在江西纪实(上)……杨一萍(11)	

(峥嵘岁月)	忆粟裕师长……	朱 勇(31)
	如火如荼的岁月	
	——忆江西省农民自卫军干部训练班李集生(35)	
	一把钢刀插入敌人心脏	
	——回忆1933年红军奔袭丰城……铁 坚(41)	

人物春秋	革命的挚友	
	——记方志敏、邵式平的老师俞君适徐弋生(45)	
	历政坛沉浮 经商界沧桑	
	——回忆我的父亲李建鼎……李觉时(54)	
	华佗再世 惠泽湘赣	
	——记名中医赖良蒲……熊巢生(62)	
	我的父亲是张天师……张婉香(68)	

军事纵横	陈诚与庐山军官训练团……王宪章(75)
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主 编 聂国柱 副主编、责任编辑 曾 粮

赣籍将领 抗日骁将周志道...吴 鸢(89)

历史内幕 顾祝同策划“皖南事变”内幕...蔡水泉(100)

《沧桑录》 安息投诚亲历记 杨在松(113)

百年钩沉 长官部有座情报室 徐从周(118)

地方风物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
——赣东北民间风俗概览.....朱火金(127)

拾遗补阙 民国时期江西邮政二三事.....屠馥葵(137)
罗炳辉审问“共产党”.....程 川(10)
王虎辰舍己救人.....梁镇国(67)
京剧《朱聋卖画》来由.....梁镇国(99)

社会黑幕 人间地狱——马家洲集中营...尹建华(137)

编 务 涂苏中 雷心刚 易芳霖 胡群红
黄 茜

主 办：江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编 者：江西省政协文史办公室(电话783861)

承 印：南昌市红星印刷厂

刊 号：赣刊字第01-148号 每册：2.20元

怀念集

谈笑凯歌还

——记周恩来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

徐 巍 · 凌家传



周恩来与八一馆工作人员合影

编者按：1993年1月8日是周恩来同志逝世17周年纪念日。本期发表两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，以志怀念。

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八日，秋高气爽。党中央在庐山召开的重要会议刚刚结束，每天都有许多负责同志来八一纪念馆参观。当时，南昌城中已传出周恩来到南昌，并与群众亲切交谈的消息。但我们又听说，周恩来一贯谦虚，不肯参观为纪念他的业迹而设立的纪念馆。尽管

如此，每天仍然有许多群众在纪念馆周围徘徊，我们的心里更是焦急的期待。

这天下午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根据约定，要陪周恩来到郊区农村作调查。杨尚奎行前又一次向周恩来提出，希望他抽点时间先参观一下八一纪念馆，主要是起义中有一些重要史实，各回忆者的说法不同，希望他能作些解答。杨尚奎的要求很恳切，周恩来微笑着答应了，他说：“好吧！那就去看看吧，一面给你们提供点帮助，一面我也好总结点经验教训。”

汽车缓缓开进了纪念馆，周恩来穿一件退了色的灰卡叽布中山装，步出了汽车。红润的面庞，奕奕的眼神，轻捷的步伐，一下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“党代表回来了！”担任门卫的原江西大旅社老工人兴奋地高喊，激动使他忘记了喊总理，而埋藏在心底三十多年的老称呼，竟一下子脱口而出。这时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闻声一起涌了出来，周恩来笑着，和大家一一握手，而后邀大家一齐向大楼内走去。

周恩来缓步登上台阶，笑着对大家说：“是这所房子，没有变。有人在北京说，我住在这里，我说，我没有住在这里，但是，常在这里开会工作，这个地方我熟悉。”说着，他参观了警卫和卫生部队的住室，走进了会议大厅。

会议大厅还是当年的陈设。开会的桌椅整齐的排列着，时钟指向有历史意义的两点整。党代表的到来，仿佛使这些文物都焕发出异样的光彩。恩来同志在会议大厅里轻轻的走着，思潮起伏。杨尚奎问：“你在这里开过会吧！”恩来同志点点头说：“开过，有些重要会议是在这里开的。”停了一下，他又说：“七月二十七日，是在这里成立了前委。决定南昌起义，是对的。本来应该早动手，但被陈独秀耽误了。在汪精卫准备叛变时，我们当时已经有一个军，两个师和武汉警卫团，以当时的学校作骨干，再加上湖南、湖北的工农武装和武汉的工人纠察队，组织五万到

七万军队是可能的，有这些条件不去运用，很可惜。到了七月下旬，汪精卫已经公开反共了，再不动手，连剩下的武装力量也保不住，时机是相当紧迫的。所以，在这里开会时，对于要立即起义，是几乎一致的意见。”

会议大厅旁边的一套客房，是参谋团的办公室。参谋团是前委领导下的军事指挥机关，周恩来作为参谋团成员，曾多次在这里开会，研究部署军事行动。周恩来亲切地望着那些熟悉的陈设，一面耐心地听着我们的提问。他说：参谋团的一些重要会议，有时在这里开，有时在贺龙、刘伯承住的地方开。”他将参谋团成员的名字一一告诉了我们，还说：“参谋团主任不是我，是伯承同志。”接着，他在椅子上坐下来，以深挚的感情说：“开始，参谋团没有人任参谋长，我就指定刘伯承同志做，起初他谦虚不肯答应，后来我说，一定要你做，他才担任了这个职务。”停了一下，他又说：“伯承同志在南昌起义中是立了功的，他一贯周到细致，作战指挥很有办法。”

我们跟随周恩来同志，登上二楼陈列室。温和幽默的谈话，平易近人的作风，使大家早已忘掉了紧张和拘束，团团围着周恩来同志，并不时你一言我一语的提出各种问题。

在听参加起义部队的介绍时，周恩来对贺龙和叶挺两个指挥部的房屋模型很感兴趣。他说：“贺龙住的这栋房子，我的印象很深，是两层楼房，伯承同志也住在那里。当时，我多次去过，和贺龙谈工作，参加会议。贺龙当时领导了一个军，是起义军中的‘大户’，他性格豪爽，斗争坚决，什么敌人也不怕，……”停了一下，他又指着叶挺司令部说：“北伐时，叶挺的独立团是能够战斗的，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在部队中起作用，从广东一直打到武汉，所向无敌。他的指挥部设在一所学校里，校名叫心远，校长叫熊育锡。”事隔三十多年，周恩来还能一口气说出一所普通学校和校长的名字，而纪念馆有些工作人员至今还说不出。周

恩来的惊人记忆力，叫我们深深叹服。他又说：“我住的地方离叶挺近，离贺龙较远。南昌起义失败后，叶挺又参加了广州起义，失败后到了莫斯科，共产国际责怪他，他受了很多冤曲，皖南事变时，他是非常英勇的，被捕后也从未向国民党低头，他因飞机失事牺牲，是很可惜的。”

二楼的25号房间，是周恩来工作过的地方，墙上挂有他当年的照片，周恩来看了一眼，匆匆离去，说：“我没有住在这里。”杨尚奎忙追问道：“你总在这里工作过吧。”周恩来点了点头。很明显，周恩来是出于谦虚，不肯在自己工作过的地方，谈论自己。但是，历史可以作证。这个党代表的工作室，当年曾在人们心中点燃了多么巨大的革命火焰，从旅社老工人到起义老战士，都以极端崇敬的心情，谈到党代表在大旅社热情忘我工作的动人情景。过了一会，我们在朱德旧居照片前问周恩来同志：“听说您来南昌的第一天，就住在朱德的家里。”他笑着说，“是的，我以后住的地方是一所学校，也是朱德找的。”接着，他又说：“朱德在南昌起义时，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响导，他对南昌的情形非常清楚，各方关系又熟，起义后，他出任九军军长，没有多少兵，但是后来却把队伍带上了井冈山，为人民立了大功。”

在听到起义前夕，前委开会与张国焘争论的介绍时，周恩来停止了参观的脚步，笑着对大家说：“当时的争论的确是很激烈的。在我们就要行动时，张国焘赶来竭力反对，气的我在会上拍了桌子，有的人还主张把张国焘绑起来，我不同意，说：‘张国焘是中央代表，怎么能绑呢？’从这次争论后，张国焘在起义部队中很孤立，很多人都瞧不起他。”稍停，他又说：“起义那天，我们还在叶挺司令部开会，讨论争取蔡廷锴问题，贺龙主张将蔡扣起来，后来，蔡答应随我们一起起义，会议才结束。但是在开往抚州途中，他又开了小差。”

在参观到起义战斗的陈列时，由于一些回忆提供的情况不相

同，杨尚奎代表我们，向周恩来同志提出了起义时间、敌我人数、战斗地点、战果等一系列问题。听着这连珠炮式的提问，周恩来同志笑了，他很耐心的给我们作了回答和解释。并说：“起义军实际人数没有三万，是号称三万。”起义打响是十二点以后，贺龙是总指挥，他是记得清楚的。他又反问：“你们现在说几点？”我们答：“是凌晨两点。”恩来同志点点头说：“就说两点吧，时间不是主要的。”接着他又指着起义军各路指挥人员名单，一一讲出了这些同志以后的去向，当说到李硕勋、方维夏等同志时，他那明亮眼神里浮起了哀愁，语调变得冷静凝重，他们是哪年哪月在哪个地方牺牲的，他都记得一清二楚。

当参观到起义部队开始南征时，周恩来走到一座沙盘前，第一次谈到自己。周恩来把手向沙盘东部一指，说：“南昌起义后，要是不向南，而是向东，就地发展就好了。假使就地革命，不一定能保住南昌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。这也是没有经验，只晓得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，国际指示要建立根据地，而我们就只想建立城市根据地，搞大城市起义，没有认识到，要搞农村起义。我们走了，人民群众是不高兴的。在农村建立根据地，当时只有毛主席提出来。因此，南昌起义的宣传，一定要讲到井冈山，在起义失败后，当年党中央开了个会，就是责备一顿，没有总结什么经验，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，有很多教训要吸取。”周恩来说这段话时，感情严肃，声调很慢，他那种严于律己的一片赤诚，使我们深受感动。

参观到起义军在潮汕激战的陈列时，周恩来同志的情绪，又活跃了起来。当讲解员说到：周恩来、贺龙都在汤坑前线指挥时，他连忙纠正道：“我没有去汤坑，当时曾决定我去，但没有走成，那时，我和周逸群在汕头指挥军队和敌人的海军作战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的眼神一亮，笑着对大家说：“记得前方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，还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故事。那天，我打电话到汤

坑去找叶挺，接电话的却是敌人黄绍竑的部队，他们又把我误认是自己人，要我赶快搞几十个车皮去，我才知前方形势不好，我一面应付他们说马上派，放下电话，就把所有的车皮都扣了，连夜开会决定转移。”说到这里，周恩来和杨尚奎一起都笑了。接着，他又说：“后来部队往海陆丰转移，我带了一连人打后卫，和敌人打了一阵。直到一部分部队到了海陆丰，我才转道回到了上海。”大家都知道，在这段最艰苦的日子里，周恩来是以重病之身坚持战斗在现场指挥岗位上的。

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两个小时，我们请周恩来到休息室休息，并要求他题词。周恩来拿起题词簿，兴致勃勃地逐页翻阅着。当他读到陈毅同志热情洋溢的一篇题词时，脸上露出了赞许的微笑。他说：“今天我就不题词了，这个任务我带回去，我要写经验和教训寄给你们。”当他从我们每一个人脸上看到深切依恋之情时，说：“我知道你们还有许多问题要问，但我现在没有时间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回忆，回北京后，我替你们请国务院参事陈公培先生来，他当时在军事部工作，了解很多情况，可以作你们的顾问，许多事情可以问他。”周恩来同志这种关怀体贴下级，细致周到解决具体问题的优良作风，又一次使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分别的时候到了，我们簇拥着周恩来同志走出休息室。在照相时，大家要周恩来同志站在当中，他笑着，要几个年轻人站过来，站在自己的前面。他说：“年轻人站前排，你们是革命事业接班人嘛！”

周恩来登上汽车时，纪念馆外已挤满了人群，中山路都堵塞了。在群众的鼓掌欢呼声中，周恩来的汽车缓缓驶过，他不住地向群众微笑招手，我们目送着汽车远去，一股暖流仍在心中激荡，使人感奋不已。

（作者系南昌市八一起义纪念馆工作人员）

电波，永不消逝

——周恩来与「第二战场」的机要通讯

· 刘三元 ·

1940年6月，我跟随周恩来副主席来到重庆，担任中共南方局机要科长。抗战时期的重庆，是国民党的“陪都”。我们重庆办事处的驻地在红岩，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在曾家岩50号，当时称周公馆，是一栋三层楼的老房子。红岩办事处二楼也设有周恩来的办公室。

重庆办事处和周公馆的四周，国民党的暗探、特务多如蚁群，他们身穿各式各样的服装，伪装成各种“职业”的身份，不分白天黑夜地监视我们。另外，重庆办事处和周公馆附近，名为国民党参事室的办公楼和宿舍，实际上都是国民党宪警、特务的据点。化龙桥，紧靠我车队住地，也住有国民党宪警，并配有车辆和军犬。

重庆办事处办公楼盖在红岩的半山腰，即十万山坡，离化龙桥大马路约半里路。只要我办事处的同志一出办公楼门，不管人多人少，国民党的暗探、特务就尾随身后监视盯梢。如果你是一个人，他们就乘你不备，搞突然逮捕。被捕之后，如果你顶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，在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自首书上签个名，拍一个照，马上可以放你走，但必须在他们控制下为国民党工作。如果你顽强不屈，坚定不移，他们就会把你装进麻袋投入嘉陵江淹死。曾家岩周公馆在市内，远离红岩，车子还不能开进去，要在一条胡同口停下来，步行一百多

米，才能到周公馆。这条胡同小而狭，沿街两旁都是一些饭铺、杂货之类的小店和小摊贩，只要我们的人一进胡同，设在胡同口的坐探马上打暗号给住在楼里的“常客”。所以，我们进了办公楼，这些“常客”就马上在房门口“迎接”我们。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环境。周恩来同志就是在这种环境中为党为革命工作的。

我跟随周副主席在重庆三年多，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下，同办事处的同志们一起，忘我地为党为革命工作，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。

国民党对我们的工作无孔不入地进行破坏。有一次，周恩来同志正在同来访者谈话，潜伏在二楼的一位“常客”，从他们事先钻好的地板缝里的一个小洞偷听，当即被我们发现。我们故意装作不知道，只是大声说笑、放留声机来进行干扰。

当时，除了国民党的干扰、破坏以及迫害外，气候也非常恶劣。重庆号称“火炉”，夏季炎热时，气温常在 39°C 至 40°C 上下，热得人们喘不过气来。我们做机要通讯工作的同志，为了保密起见，一年四季都紧闭办公室窗户，并且挂上红黑两层的窗帘。这样，空气不流通，室内温度更高，简直像个大蒸笼。我们译电员，不分白天黑夜，光着身子，只穿一条短裤衩，仍汗流夹背。尤其在夜间，工作时间久了，困倦疲乏，头昏眼花，便跑到楼下用自来水冲冲头，清醒一下头脑。有时候，还打上一桶水，放在桌子底下，两只脚泡在水桶里，再在背上披一条湿毛巾，借以降温。冬天，房子四面透风，又没有取暖设备，到了深夜，更是冻得难忍。实在冷得抗不住了，我们就把被子披在背上。尽管如此，我们机要通讯人员都以坚韧不拔的精神，全心全意、满腔热情地为党工作，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

在重庆期间，周恩来同志利用重庆办事处合法的便利条件，亲自指示童小鹏和申光同志，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海外关系，采办了大批电讯器材，运往延安等地，建立我党我军现代化的机要通

讯工作网。当时，在上海、武汉、南京、重庆、桂林、湖南、成都、江西、昆明、广东等数十个地区，先后建立起60多个电台。在短短几年里，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，使南方各省都建立了一整套无线电秘密通讯网。同时，还培训和组织了一大批机要译电人员、电台报务员和技术人员。其中，有的是就地培训的，有的是从延安来的。

周恩来同志还非常重视和关心机要通讯工作人员的思想建设，经常对机要通讯工作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、革命气节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。同时，他还指示有关领导同志，为机要通讯工作制订了一整套保密制度。例如：机要办公地点，一切闲人不得进入；密码本分为普通和核心两种，绝不能丢失，并指定专人翻译；密码本的使用方法和暗号，只能本人知道；同事之间禁止发生横的关系，电报机密内容限制在一定范围，同事（包括夫妻）之间也不允许交谈；译电人员必须守口如瓶、心细如发，不应知的不求知，并且做到随收、随译、随送，等等。

我记得在重庆办事处的时候，机要办公地点设在三楼。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，童小鹏同志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，在三楼楼梯口进门处墙上，贴了一张显眼的画，并写了“同志，请止步”五个大字，杜绝一切闲人进入三楼。当时，无论上下领导或同志，都能自觉遵守。

我还记得有这样一件事。1938年4月，党中央决定派张国焘去朝拜黄帝陵，张国焘辜负了党对他的信任，乘机背叛了革命。张国焘投入国民党怀抱后，四方面军许多同志思想背了包袱，产生了顾虑。党中央便电告各地党组织和部队领导，对四方面军的同志应“一视同仁”。当时，一位译电员由于不细心，把“一视同仁”译成“有所不同”。幸亏有关首长及时发现，予以纠正，才避免造成思想上的混乱。由此可见机要通讯工作的重要。

我们机要通讯工作人员，跟随周恩来同志，战斗在国统区的

第二战场上，顺利地完成了党交办的各种机要通讯工作任务，保证了无线电波的畅通。

（稷川 整理）

罗炳辉审问“共产党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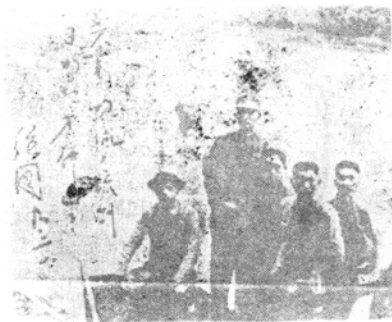
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我军高级将领罗炳辉，是从旧队伍中起义过来的。1929年6月，罗炳辉来到吉安，就任国民党吉安靖卫大队长。由于罗炳辉秉性耿直，不善逢迎，故而与当时的官场作风格格不入。县长冷照升“好心”地向罗传授当官的“经验”：“对百姓要做老虎，对中小商人要做阎王，对豪绅、资本家要做公婆，对上峰要做小媳妇。”罗炳辉轻蔑地说：“我不做贪赃枉法的狗官。”冷照升讨了个没趣。有一次，靖卫大队抓来几个苏区干部和群众，说是“共匪”。罗炳辉想知道“共匪”是些什么人，便亲自审问。被审的人都说自己是老百姓，罗炳辉便问：“你们为什么要造反？”这些人回答：“国民党苛捐杂税逼得人死，横竖一死，不如拼了好！”罗炳辉佩服这些人的胆略，也同情他们的遭遇，便下令将这些“共匪”统统放了。吉安地方的一些地主豪绅便状告罗炳辉放走、纵容“共党分子”。上峰质问：“为什么要放走共产党？”罗炳辉坦然地说：“我没看见什么共产党，我放的都是老百姓，我还给了他们钱，如果把老百姓都杀了，你们的吃穿哪里来？”

（稷川）

○历史大特写○

——蒋经国在江西纪实（上）

滔滔赣江东逝水



蒋经国在新赣南河上与干部合影

杨一萍

前言

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间，笔者的父亲（杨安中，现居台湾）在赣州任第三区（王母渡）区长、赣州警察局局长、赣州县政府军事科科长等职，与蒋经国、徐君虎等人的

交情很深。蒋经国调到重庆后，家父又调往重庆市。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又随蒋经国在上海、南京等地任职。对蒋经国有深刻的了解。

为了使人们便于了解蒋经国的思想性格和政治性格，笔者本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忠于事实的观点，通过回忆少年

时期在赣州的亲见、亲闻和徐君虎先生（现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、民革湖南省委名誉主委）及家父所提供的资料，以及在其他方面搜集的资料，整理成文，以供各界读者参考。

一、豫章重逢

一九三八年春天，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经从中国的东北踏进了中原，国民党政府撤到武汉。山东济南、山西太原相继沦陷，中国大片国土上的黎民正陷在国破家亡、妻离子散的处境中，然而，在广西桂林，这个素有风景甲天下的华南名城，仍然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，这里，没有战争的硝烟，没有流离失所的难民，表面上好象是世外桃源，但是这种气氛，仅仅是在表面而已，国家民族面临的生死存亡局势，保卫国土，驱除日虏的怒吼，震撼着祖国的每个角落。

在桂林市区的一条偏僻的小街上，有一家门面不显眼的小药店，柜台里坐着一位身材

高大魁梧，年约三十岁左右的壮汉，他就是这家药店的“掌柜”。此人姓徐名君虎，湖南省新宁县人氏，一九二五年曾经在苏联莫斯科孙逸仙劳动大学（中山大学）学习，与蒋经国是同窗好友。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的形势，正迅速地向前发展，北伐军中急需大批的军事政治干部，中山大学组织决定，先派遣一部份中共党员、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回国，充实国民革命军和各群团组织中的政治干部力量，徐君虎就是这年春天秘密回国的，他回国后，就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，担任师长陈嘉佑的秘书，陈嘉佑原是湘军讲武堂（后称第二军军官学校）的教育长，徐君虎去苏联留学以前，曾经在第二军军官学校学习过一个阶段，他勤奋好学，性格豪爽，深得陈嘉佑的赏识，听说徐君虎从莫斯科回国，陈嘉佑找到谭平山（国民革命军的组织部长），要把徐君虎调来第二军教导师当秘书。“四·一二”政变后，教